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秦汉魏晋南北朝 史学史稿



李小树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秦汉魏晋南北朝 史学史稿



李小树 主编

撰稿

李小树 郑明月

徐淑娟 邹绍荣

林国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李小树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10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08452-7

I. 秦…

II. 李…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②史学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0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415 号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

李小树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0×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1.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6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主编简介

李小树，1949年10月出生，四川天全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中国监察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独立及与人合作出版《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反腐败与监督通论》、《中国历朝行政管理》等著作，发表《论中国史学发展的形态演进与特征变化》、《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班固受贿写史辨疑》、《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11—19世纪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等论文。



内容提要

本书分阶段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八百余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包括不同时期史学演进的基本态势及其特征，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史学传播在形式、内容、范围、功用诸方面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间史学活动的基本状况，两汉时期中国史学的嬗变，十六国北朝史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门阀世族的衰变与南朝史学的内容取向，佛、道二教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影响，著名史家的生平活动及其代表性史著的内容与特征，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态势、制度设置、内容变迁、形式选择、表述方式、思想观念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时期，八百余年间的艰苦探索与不懈追求，以及“独绝今古”的丰硕成果和杰出贡献，使这一时期的史家给后世留下了令人景仰的群体形象。与此同时，也使中国传统史学在制度设置、内容取向、形式选择、表述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基本特质及其宏观把握与具体操作的主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一时期的史学所“定格”，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自此以后的诸多变化，大都能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窥见其“身影”。因而，将这一时期的史学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定型期”，似乎并不为过。这种状况使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吸引我们撰写本书对其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即便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尽管这一时期的史学对于“当代”而言，在时间距离上已经显得相对“遥远”，却始终始终是史学史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诸如朱希祖、金毓黻、白寿彝、刘节、朱杰勤、周一良、杨翼骧、张孟伦、黎子耀、仓修良、魏得良、陶懋炳、陈光崇、高敏、张大可、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施丁、王树民、朱仲玉、高国抗、王俊杰、葛兆光、彭卫、胡宝国、黄朴民、张涛、牛润珍、刘隆有、邱敏、顾奎相、李颖科、许殿才、汪高鑫、庞天佑、李传印、柳维本、韩杰、吴振清、李润和、石荣伦、方光华、王记录、刘斯翰、王玉华、傅永聚、范学辉、王炜，以及钱穆、李宗侗、逯耀东等众多的前辈学者和时贤，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精深的研究，对

揭示这一时期史学的“原貌”贡献良多，也对本书的探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是首先应当感谢的。相关的论著我们于文末“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中一一列出，具体引述则随文标注，如有不周，敬祈见谅。

从一定的角度上可以说，所谓史学，事实上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某一特定时代的史学活动者和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学术取向、民族关系等，对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活动者的思想、素质、研究条件、表达方式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推动或制约着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史学活动者能动地认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记录其过程，探讨其原因与规律，并将这种认识、记录与探讨以史学成果的形式予以表述与传播，以影响客体——社会。由此，社会与史学活动者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色的史学。基于上述认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包括每一特定时代为史学发展提供的社会环境，社会发展对史学提出的要求，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们对史学的态度，史学活动者群体和个人由此而受到的影响等，以及史学活动者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记录和探讨，他们在史学活动中用何种思想、何种方法和形式影响社会，是本书关注与探讨的一个重点。

史学的传播是本书探讨的另一重点。我们认为，史学的“任职”是记录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历程，探索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史学的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这主要涵盖两个层面，一是直观的、表层的社会现象，如政权的兴起与衰亡，社会的稳定与动荡，“世风”的淳厚与浇薄，观念的形成与演进，以及事件的发生与结果、人物的活动与命运等，这些都是人们的感观能够直接接触及的历史现象，是史学记述的直接对象。二是内在的、深层的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需要人们通过对历史现象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才能揭示它，总结它。而二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和蕴涵于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其二，研究目的的社会性。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而是为人类社会本

身服务的。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索规律，明确方向，都离不开这一目的，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史学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其传播范围与研究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同时，传播范围愈广，其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和价值大小也会得到愈加严格和更为公正的检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史学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传播范围的广狭往往决定着它对人们和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影响程度。正因为如此，史学的传播包括传播的不同形式、内容变化、接受范围，它在史学政治鉴戒、道德教化和素质教育等社会功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间史学活动的状况，包括民间撰史活动、民间的史著抄写与传阅活动、民间私学与家学授史活动、民间通俗历史讲唱活动、这些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等，是我们关注的另一重点。

除上述两方面之外，本书从一个时代史学整体状况的角度考察了两汉四百余年史学的嬗变，包括史著状况的嬗变、记述内容的嬗变、目标追求的嬗变和史学意识的嬗变。对于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和文化碰撞最为频繁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本书就史学在民族文化融合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包括史学与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史学与民族学术文化的融合，力争揭示史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南朝代表性史著内容取向的分析，本书探讨了门阀世族衰变过程中南朝史家对史学基本原则的态度及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以及二者对史学的影响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使魏晋南北朝史学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也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具有一种异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本书对这一特点进行了考察。对“托物留名”的心理需求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本书分阶段进行了探讨。此外，本书对班固受贿写史和陈寿“谤议”诸葛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订，希望对澄清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本书在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点探讨的同时，适当兼顾系统性，即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基本状况及主要史家和史著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以使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态势”的考察显得相对连续，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本书的“整体感”。

本书的撰写具体分工如下：

李小树：第一、二、四、五、九、十、十一章；

郑明月：第三章；

邹绍荣：第六章；

徐淑娟：第七章；

林国妮：第八章。

全书的统编和定稿工作由李小树负责。

多年以来，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桦教授、黄朴民教授、成崇德教授、孙家洲教授、刘后滨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致谢意。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宋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兆仁教授、常伯工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进行鉴定。北京师范大学张涛教授、罗炳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怡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孙家洲教授、徐兆仁教授、牛润珍教授、刘后滨教授、孟宪实教授、韩树峰教授对本书的一些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特致谢意。当然，所有文责均由我们自负。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谢。

毫无疑问，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无论在观念、内容、体裁还是表述形式上都是十分丰富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书只是我们的一些初步探索与思考，疏漏与不当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小树

2005年11月

| | |
|-----------------------------|----|
| 第一章 秦汉史学的发展历程 | 1 |
| 第一节 秦王朝统治下的史学 | 1 |
| 一、统一前的秦国史学 | 1 |
| 二、秦王朝的文化专制和史学的衰落 | 4 |
| 第二节 西汉时期的史学 | 7 |
| 一、西汉时期史学的复兴 | 7 |
| 二、西汉的史官 | 14 |
|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史学 | 16 |
| 一、东汉史学的发展 | 16 |
| 二、郡国人物传的撰修和地理风俗类史著的增多 | 21 |
| 三、东汉政府对史学控制的加强 | 24 |
| 第二章 秦汉时期史学的传播 | 26 |
| 第一节 秦汉以前史学的传播 | 26 |
| 一、口头讲史与文字记史 | 26 |
| 二、不同类型的讲史活动 | 29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史学的传播 | 33 |
| 一、史书的抄写、传阅与流通 | 33 |
| 二、讲史活动的发展与变化 | 35 |

| | |
|-------------------------------------|-----|
| 第三章 两汉史学的嬗变 | 43 |
| 第一节 一书独秀与百史争妍——史著状况的嬗变 | 43 |
| 一、数量悬殊的两汉史著 | 43 |
| 二、两汉史著数量差异原因探析 | 45 |
| 第二节 全局视野与地区关注——记述内容的嬗变 | 63 |
| 一、全局视野下的西汉史学 | 63 |
| 二、东汉史著的地区关注 | 66 |
| 第三节 学术传承与政治借鉴——目标追求的嬗变 | 75 |
| 一、西汉史学的学术追求 | 75 |
| 二、以政治借鉴为己任的东汉史学 | 78 |
| 第四节 会通意识与断代撰史——史学意识的嬗变 | 81 |
| 一、会通意识指导下的西汉史学 | 82 |
| 二、以断代撰述为特征的东汉史学 | 83 |
| 第四章 三国与西晋时期的史学 | 89 |
| 第一节 三国鼎立时期的史学 | 89 |
| 一、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对史学的影响 | 89 |
| 二、鼎立局面的形成与史学的逐步恢复 | 90 |
| 三、世族人物传的撰修和历史观的变化 | 95 |
| 第二节 统一局面下的西晋史学 | 96 |
| 一、西晋时期史学的发展 | 96 |
| 二、西晋史学发展的历史条件 | 99 |
| 三、西晋史学中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 | 101 |
| 第五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学 | 103 |
| 第一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繁荣 | 103 |
| 一、走向繁荣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学 | 103 |
| 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学繁荣的时代背景 | 106 |
| 三、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学中的历史观 | 114 |
| 第二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学的时代特征 | 115 |
| 一、门阀制度的影响和佛、道二教的渗透 | 116 |
| 二、起居注的普遍撰修与实录的出现 | 119 |
| 三、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民族正统观的浓厚 | 120 |
| 第六章 十六国北朝的史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 122 |
| 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著的撰修与流传 | 122 |

| | |
|-----------------------------------|------------|
| 一、十六国北朝时期史著的撰修 | 122 |
| 二、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原因 | 129 |
| 三、十六国北朝时期史著的流传 | 133 |
| 第二节 十六国北朝史学的特征 | 135 |
| 一、为现实服务的史著内容 | 135 |
| 二、以官方史学为主流的史著撰修 | 139 |
| 三、秉笔直书与曲笔阿时共存 | 144 |
| 四、“华夷正统”之争中的大一统思想 | 146 |
|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的史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 148 |
| 一、史学与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 | 148 |
| 二、史学与民族学术文化的融合 | 156 |
| 第七章 士族的衰变与南朝史学的内容取向 | 161 |
| 第一节 南朝士族的衰变 | 161 |
| 一、士族的形成及其特征 | 161 |
| 二、南朝士族的衰变 | 163 |
| 第二节 《宋书》列传对士族人物的记述 | 168 |
| 一、《宋书》列传中士族人物的记述比例及其原因 | 168 |
| 二、《宋书》对士族人物的基本态度 | 180 |
| 第三节 《宋书》列传对非士族人物的记述 | 183 |
| 一、《宋书》中非士族人物的入传特征 | 183 |
| 二、《宋书》列传人物入传标准总结 | 186 |
| 第四节 《南齐书》列传对士族与非士族人物的记述 | 187 |
| 一、《南齐书》列传对士族人物的记述 | 187 |
| 二、《南齐书》列传对非士族人物的记述 | 193 |
| 第八章 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 197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传播 | 197 |
| 一、战乱的局面与佛、道二教的传播机遇 | 198 |
| 二、民族矛盾的激化与佛教的广泛传播 | 201 |
| 三、佛、道二教迅速发展的文化基础 | 203 |
| 第二节 佛、道二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的影响 | 205 |
| 一、对正史内容取向的影响 | 206 |
| 二、正史中佛、道典志的出现 | 209 |
| 第三节 佛、道二教对魏晋南北朝“杂传” | |

| | |
|-------------------------------------|------------|
| 与“史注”的影响 | 210 |
| 一、佛、道二教对“杂传”的影响 | 210 |
| 二、佛教的传入对传统史注形式的影响 | 212 |
| 第四节 佛、道二教对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的影响 | 213 |
| 一、为现实服务思想的强化 | 214 |
| 二、宗教迷信色彩的加重 | 217 |
| 三、民族观和世界观的开阔 | 219 |
| 第五节 佛教史学和道教史学的产生 | 221 |
| 一、佛教史学的产生 | 221 |
| 二、道教史学的产生 | 225 |
|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的民间史学活动 | 228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民间的史著撰修、 抄写与传阅活动 | 228 |
| 一、民间的史著撰修活动 | 229 |
| 二、民间的史著抄写与传阅活动 | 231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民间授史活动与 通俗历史讲唱活动 | 234 |
| 一、民间私学与家学授史活动 | 234 |
| 二、民间通俗历史讲唱活动 | 238 |
| 第十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家与史著 | 241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史家与史著 | 241 |
| 一、司马迁和《史记》 | 241 |
| 二、班固和《汉书》 | 257 |
| 三、《东观汉记》 | 264 |
| 四、荀悦和《汉纪》 | 268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与史著 | 272 |
| 一、陈寿和《三国志》 | 272 |
| 二、袁宏和《后汉纪》 | 275 |
| 三、范晔和《后汉书》 | 277 |
| 四、沈约和《宋书》 | 280 |
| 五、萧子显和《南齐书》 | 283 |
| 六、魏收和《魏书》 | 285 |
| 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史家与史著 | 289 |

| | |
|-------------------------|-----|
| 第十一章 关于班固“受金”写史和陈寿 | |
| “谤议”诸葛亮问题 | 299 |
| 第一节 关于班固“受金”写史问题 | 299 |
| 一、问题的提出 | 299 |
| 二、难以成立的罪名 | 301 |
| 三、“受金”为“受命”的讹误 | 304 |
| 第二节 关于陈寿“谤议”诸葛亮问题 | 309 |
| 一、对陈寿史德的两点指责 | 309 |
| 二、“寿父为马谡参军”与事实不符 | 311 |
| 三、“寿父亦坐被髡”也与事实不符 | 313 |
| 四、陈寿受诬探源 | 315 |
| 参考文献 | 318 |

秦汉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秦王朝统治下的史学

一、统一前的秦国史学

秦王朝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完成统一而形成的大一统政权，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秦国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史学也不例外。因而，统一之前秦国史学的状况，是秦王朝统治下史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根据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和秦国陵园的发掘结果看，秦国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东方诸国以“夷翟遇之”^①，但早在春秋时期，无论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文化发展状况，秦国都不落后于其他诸侯国，在史学方面，情况也大致相同。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秦于公元前770年建国，其时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所谓“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②。而在立国十七年后便设置史官记录史事，开始了秦国历史的记载与《秦记》的撰修工作，这是秦国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史记》卷五，《秦本纪》，179页。

官方史学初步形成的标志。同时，“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的记述，当是《秦记》原文，这种将以史记事与“民多化者”联系在一起的表述，显示了秦国统治者及史官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初步认识。此外，秦穆公时，秦国史官内史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秦穆公曾就秦国的一些政务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命其与西戎联系。这些都说明，史学在秦国是比较受重视的。

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较为原始、保存相对完整的秦国史官的记录，是《尚书》中的《秦誓》。《尚书正义》在对《秦誓》的注疏中说：“秦穆公使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帅师伐郑，未至郑而还，晋襄公帅师败之于崤山，囚其三帅。后晋舍三帅，得还归于秦。秦穆公自悔已过，誓戒群臣，史录其誓辞，作《秦誓》。”^①可见，这是由史官记录的秦穆公的誓辞。此事发生在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时，秦国史官“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②。二者相距三百多年，前者记言，后者记事，这在制度上同《礼记·玉藻》中有关先秦时“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③的记载，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记事制度是相吻合的。^④由此可以看出，秦国当时以史记言、以史记事已经制度化且延续时间比较长了，这使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记录与保存有了基本的保证。

如果将《秦誓》与《尚书》中的另一篇章《文侯之命》相对照，情况更为清楚。《文侯之命》记录的是周平王的一篇策书，其时，“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立而东迁洛邑，晋文侯迎送安定”有功，周平王遂赐奖晋文侯，并“作策书命之”，最后由“史录其策书”^⑤而形成此篇。也就是说，《文侯之命》是周王室史官所记的平王策命，《秦誓》则为秦国史官所录秦穆公誓辞，二者在成篇时间上相距不

① 《十三经注疏》，256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②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202页。

③ 《十三经注疏》，1473~1474页。

④ 关于左、右史在记言、记事分工上的不同记载，请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 《十三经注疏》，253页。

远，将其对照可以看出，《秦誓》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逊色，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则有所进步，这是秦国史学并不落后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重要体现。

此外，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载录了“秦昭和钟”的铭文，内容为：“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国十有二公’”^①，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天命色彩。欧阳修考定钟铭作于秦共公或秦景公时期，即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中期。^②比较而言，《秦誓》稍早而主谈人事，此铭略晚却称颂天命，显示出当时新旧历史观相互交织的基本态势，这在历史观念上与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史学的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作为秦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改革，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而在文化和史学方面，从反映商鞅变法思想的《商君书》中，体现出了商鞅对重视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儒学所持的排斥态度。在《商君书·靳令》中，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仁义等被斥为“六虱”。《商君书·去强》中又说：“国用诗、书、礼、乐……敌至必削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作为“主政者”的商鞅不可能制定和推行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在史学方面，商鞅主张师今不师古。他曾十分明确地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商、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③在这种“轻古”的变革环境中，史学不会有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史官设置和记录史事的制度作为一种“惯例”仍然保持不变，因而，秦国的史学并没有因主持变法者师今不师古的主张而受到明显的影响。上面提到的变法之后的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时，秦国史官仍

^① 《集古录跋尾》卷一，《秦昭和钟铭》，见《欧阳修全集》，1098页，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6。赵明诚在《金石录跋尾》中所载铭文内容相同，只是不录“秦公曰”三字，见金文明：《金石录校证》，215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② 秦共公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08年—前604年，秦景公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76年—前537年。赵明诚在《金石录跋尾》中认为该铭作于景公时期，与欧阳修的考订大致相同，见金文明：《金石录校证》，215页。

^③ 《商子》卷一，《更法》，见程荣纂辑：《汉魏丛书》，607~608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